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左宗棠 彭玉麟 沈葆楨

诗文选译

● 阎 湘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左宗棠彭玉麟沈葆楨
诗文选译

阎 湘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周伯谦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左宗棠 彭玉麟 沈葆桢诗文选译

阎 湘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8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23—816—2/1·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序 言

戴 逸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铤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前 言

—

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个朝代。它经历了“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转衰，危机四伏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国内土地兼并空前严重，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政治黑暗，社会风气败坏，大小官吏普遍贪污腐化；清王朝拥有的 22 万八旗兵和 66 万绿营兵原曾称雄一时，此时也早已腐败不堪，严重失去了战斗力。1840 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了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随着外来侵略的扩大，中华民族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内各种固有的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终于，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

当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长江中下游发展的时候，清朝在籍侍郎曾国藩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湘军。湘军是一支地方封建军阀武装，它忠实地服务于清王朝，在组成后，虽屡战

屡败，但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绞杀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暂时避免了灭亡。此后，湘军集团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及稍后的捻军、回民、苗民起义，平定新疆叛乱的军事行动中逐渐扩大影响，其主要将领大多当上总督、巡抚之类的“封疆大吏”，左右了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成为近代重要的历史人物。

对待这些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有必要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首先，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其阶级性决定了他们在封建统治面临危机之时，必然会全力以赴，千方百计为挽救本阶级统治而战，对起义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其次，因为近代中国处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封建社会面临着全面危机，外来侵略威胁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对待外国侵略、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态度又有所不同，其中的一些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勇于挺身而出，维护民族利益，接受、倡办新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本书中所选诗文的作者左宗棠、彭玉麟、沈葆楨皆曾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并充当了重要角色。而在收复新疆、抗法战争和反对日本侵台这些关系到国家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或“锋颖凛凛向敌”，或请命亲赴前敌，“为各军先”，坚决和外国侵略者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敢于反抗强暴的英雄气概，有别于一味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妥协退让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

此外，左宗棠和沈葆楨在洋务运动及我国近代海防建设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三人在处理政务时较关心、同情人民的疾苦，能兴利除弊，保持较好的自身修养。这些方面和同时代的其

他封建官僚相比，也有较大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因他们属于封建统治阶级，镇压过农民起义，就不加区别地一概予以否定。对他们遗留下来的文字作品，也应有选择地介绍给广大读者。

二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父亲是塾师，家境寒素。他童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好读经世致用之书，深得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贺长龄、贺熙龄的赏识。21岁中举，1838年会试失败，遂绝意科场。

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贺长龄兄弟、陶澍、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等人主张革除时弊，致力富强，巩固边防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使左宗棠极重“经世致用”，关心社会问题，国家大事，力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动荡变革的时代，又造就了他勇于创新，能够接受新事物的性格特征。

1833年，左宗棠首次到北京参加会试时，曾写下《燕台杂感》八首，抒发对时局的忧虑。其中写道：“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表达了他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和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渴求。尤其他在第二首中涉及新疆问题，诗云：“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囊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在这首诗中，他对新疆“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这说明，早在青年时代，他不仅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经世致用之学而且对当时的社会问

題已有了相當具體的設想，為以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奠定了基礎。

1839年，鴉片戰爭前夕，左宗棠預感到侵略者不會善罷甘休，於是密切注視局勢發展，勤奮搜集、閱讀有關外国的資料，“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國朝志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涉海國故事者，每涉歷史及之，粗悉梗概。”開闊了眼界，為以後從事洋務事務奠定了思想基礎。鴉片戰爭時期，他不滿清廷排斥抵抗派，屈辱求和的態度，寫出“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的詩句。

在積極參預鎮壓太平軍的活動中，左宗棠先後升任浙江巡撫和閩浙總督。通過和太平軍作戰，他了解到西方先進武器的威力，並進一步認識到，欲維護封建統治，對抗外來侵略，必須大力採用西方的科學技術，改變“人操舟而我結筏”，“人跨駿而我騎驢”的局面。他多次上奏折建議，先後在福州、蘭州等地創辦了造船和紡織等近代工業企業，成為洋務運動的中堅人物之一，在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跨出了舉足輕重的一步。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邊疆發生了一系列危機。各殖民主義強國紛紛覬覦我國的邊疆領土。正當左宗棠在西北鎮壓捻軍和回民起義的時候，新疆的局勢日趨嚴重。1867年，中亞浩罕國軍官阿古柏乘庫車、伊犁等地爆發反清起義之機入侵我國南疆，建立“哲得沙爾國”反動政權。1871年沙俄悍然出兵強占我國新疆伊犁地區。

在要不要收復新疆，粉碎阿古柏政權，抵抗沙俄擴張的問題上，清廷一時舉棋不定。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部分封疆大吏借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事件，打着加強海防的旗號，公開提出停

兵撤饷，放弃新疆。左宗棠据理力争，连续上奏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提醒清廷，俄国企图夺取伊犁地区，蓄谋已久，“恐非笔舌所能争也。”必须做好军事对抗的准备。并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具体方案。清廷终于接受了他的主张，于1875年5月3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从1876年2月到1878年1月，左宗棠克服了军饷困竭、运输不便等困难，采用“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基本战略和“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的作战原则，肃清了阿古柏匪帮，收复了新疆，并针锋相对地抵制了沙俄的侵略，立下了不世之功。

中法战争时期，左宗棠坚决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向清廷上了著名的《时务说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884年10月底进驻福州，积极布防。又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

左宗棠非常重视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整顿盐务等治理地方的事务。他对官场的黑暗和腐败情况早已了解，意识到如不迅速改变这种情况，势必使尖锐的阶级矛盾更趋激化，严重威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因此，他在从政中，着力整顿吏治，并写下了不少有关吏治的论述，形成系统的吏治思想。他不但选印了一些前人关于吏治的言论，以劝勉地方官吏，而且也提出了自己对甄别官员的看法。他认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浹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款、操守端谨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

痿痺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又说：“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但能不要钱，不能为地方兴利除弊、讲求长治久安之道，于国计民生终鲜裨补，则亦不足贵。”表明他关心人民疾苦，提倡官吏廉洁自律，勇于任事的吏治思想。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左宗棠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并严格约束亲属。经常写信告诫子弟严格要求自己。他有一个亲戚贺升运牵连在“禁种罂粟失察案”内，主察官考虑到贺与左宗棠有“世谊”、“年谊”、“姻谊”的密切关系，想通融了事，左宗棠却不徇私情，指出贺升运“咎有应得，岂可以私废公！”左宗棠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十多年，坚持不许部下送礼。在进驻肃州时，为杜绝地方官进谒送礼，他发了一道通令，“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例禁，已早飭文武摒弃不收。”在“上下交征利”的清朝后期官场中，左宗棠的这种作风是难能可贵的。

左宗棠虽是科举出身，但他对束缚思想，毫无实用价值的八股文十分鄙薄。他在信中告诫儿子“八股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此我阅历所得之言。”教育儿子“只要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其对科举制鄙夷之情由此可见。

为主办洋务，富国强兵，他不仅主张办新式学堂，培养通西学的人才，而且赞成派留学生去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其卓识远见在时人之先。

左宗棠的诗文，用词简炼，叙事清楚了，分析严密，论说有力。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既精明干练又恃才自负的性格特点。

彭玉麟（1816—1890）又作玉麀。湖南衡阳人，字雪琴。1853年从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因军功

屡次升迁，历任知县、知府、广东按察使、安徽巡抚、兵部尚书。

彭玉麟民族意识较强，对外来侵略一向主张坚决抵抗。中法战争中，他接连上书，请求亲自领兵上前线抗法。1884年，他受命赴广东布防，在广东海南等地和士兵同甘共苦，克服重重困难，认真布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痛击来犯的敌寇。

1885年，中法议和的消息传来，他异常愤慨，立即上书反对，请求“奖率将士，为各军先。”与法国侵略者决一死战。

彭玉麟生性耿直，痛恨官场腐败，尤其痛恨那些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他在任内曾多次惩治那些有劣迹的官员，大力整顿吏治。

彭玉麟注重自身修养，对子弟要求也极为严格，这里选用的几封彭玉麟的家书，反映了他用儒家观念及传统道德规范作为行为准则以教育子弟的思想。

彭玉麟在诗词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他长年出入战阵，转战江河之上，仍吟诵不绝，留下不少诗篇。他的诗，韵律严谨，用典适度，词句华美，寓意深刻，在三人的作品中独具特色。

沈葆楨（1820—1879），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字幼丹。道光进士，历任知府、道员、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职，在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沈葆楨是林则徐的外甥，又娶了林则徐的次女为妻。少年时代的他，就已在林则徐的熏陶下产生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又继承了林则徐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

1866年10月14日，左宗棠接到调任陕甘总督、率领楚勇去西北镇压西捻军和起义回民的谕旨。这使当时尚未诞生的船政

局危在旦夕。丁忧在籍的沈葆楨即联合福州缙绅百余人，上奏清廷，恳留左宗棠暂缓西行。左宗棠在暂缓西行的同时，力荐沈葆楨主持船政。可沈葆楨却认为，以绅士担负重任，实在难办。考虑到多方面的困难，他始终逊谢不遑。

经过二次登门商请，及对诸事的妥善安排，左宗棠不顾沈葆楨的婉言拒绝，径自上疏推荐沈葆楨主持船政，使清政府于1867年2月1日降下谕旨，命令沈葆楨“先行接办”，“不准固辞”。这样，忠于清王朝的沈葆楨只好在丁忧期未滿之时就上任，主持起他所未见过的造船工业的筹办工作。

在主持福州船政局的八年中，沈葆楨本着“师夷之长技”而又避免为夷所制的原则，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坚韧不拔的精神，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使新生的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得以起步。在他的努力下，到19世纪六十年代末，福州船政局已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近代化造船厂。中国近代海军遂因此而在福建马尾诞生，并初具规模。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侵略台湾期间，他以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积极调兵遣将，部署陆海军实力备战，与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为巩固台防而大举开发台湾，通过废除旧禁、抚“番”“恤番”、开山修路、拓荒招垦、鼓励工商、机器采煤、增设府县等一系列措施，使台湾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1875年，沈葆楨奉旨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主持南洋海防。这时，他办海防的阅历已深，凭着丰富的经验和高于其他官吏的见识，他上了《复议海洋水师片》，极力主张及时建立起一支以铁甲舰为核心的外海水师。为了集中力量尽早购得铁甲舰，他主

动将三年的南洋海防经费全部让给北洋，为北洋水师的组建创造了条件。

沈葆楨还在很多方面有所建树。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治理地方，兴利除弊。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抗旱、灭蝗、赈灾、兴修水利、整顿盐务，取得一定效果，不少人将他视为林则徐的继承者。他还批评科举制，亲上《停止武闹片》，要求清廷改变这种不合时宜的取才方法，并大力倡导、支持选派留学生出洋这一新生事物。

他为官清廉，操守严谨，比较注重个人修养。他在晚清官吏中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人物。

沈葆楨诗文功底深厚，在军政活动及造船事务繁忙进行过程中仍吟诵不停，著述颇丰，他的诗文文字流畅、结构严谨，尤其他的诗作，音律分明，凝炼流畅，有一定文学价值。

三

湘军将领都是投笔从戎的读书人出身，他们在戎马倥偬之中，文事与武功两不偏废，留给后人以簪缨家世的同时，也遗留下众多的诗文、书牋、奏议。这些作品参照正史，是研究他们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另一方面，他们都是有“功名”的读书人，文字功底较深厚，故其作品亦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在这部书中，我们选择了左宗棠、彭玉麟、沈葆楨的诗文共八十余篇，从体例上分，有奏折、书信、散文、赋、诗等形式，在内容上主要是反对外来侵略、建设海防和近代工业以求自强、